

管文宁 音乐能让人变得优雅

管文宁自述
不仅是演奏音乐
还要将音乐融入生活

印象

小提琴是她 一生钟爱的事业

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小提琴，不久前，小提琴演奏家管文宁教授开播了“云上小课堂”。从视频中看她娴熟地操作，一丝不苟地讲解，不禁让人产生好奇——这位一辈子没离开小提琴的演奏家、教育家，究竟有着怎样的音乐人生？

上世纪50年代，管文宁从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小学起步，1966年分配到天津歌舞剧院，经过一场场演出的历练，在小提琴领域崭露头角。工作之余她继续深造，考入天津音乐学院进修班，将演奏技巧提升到了更高层次，对曲子的理解也更加深刻。

回归天津歌舞剧院的舞台，管文宁多次与中外指挥家合作，演出了贝多芬、莫扎特、勃拉姆斯、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及《梁祝》，首演了多位中国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和独奏曲，多次举行小提琴独奏音乐会、室内乐音乐会。只要站在舞台上，她一定要发自内心地真情流露，将演奏做到尽善尽美。

后来她调入天津音乐学院管弦系，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提高学生的演奏技巧和演奏水平上。传授琴艺的同时，组织学生登上舞台，积累演出经验。从歌舞剧院到学院，她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她的艺术天地；从舞台到课堂，她都可以让艺术闪光。

管文宁的学生，如今已是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小提琴副教授的何艺回忆：“当年上管老师的课，一定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，因为她从手指训练、音阶训练、练习曲到协奏曲、奏鸣曲、乐曲等，都要细致检查。她能随时随地完整演绎很多部协奏曲、奏鸣曲，我们上学那会儿还没有网络视频，老师的演奏帮我们更全面地掌握了乐曲的风格。而且管老师又像妈妈一样，特别关心我们的生活，处处为我们着想。”

昔日那个为求得老师认可而孜孜不倦的小女孩，现在早已能够笑着一切；曾经为了琴技更上一层楼而反复苦练的时光，为她搭建起一座更坚实的平台，她可以在那里恣意挥洒热情、诠释音乐。回味管文宁老师悠扬的演奏，聆听她年少学琴时的美好回忆，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段带有年代感滤镜的微电影，生动且温馨。

把练琴当成享受
决不能急于求成

问：您最早接触小提琴是受谁的影响？

管文宁：我生在宁夏银川，所以名字里有一个“宁”字。我父亲是工程师，母亲是教师，但他们都非常喜欢音乐。我父亲年轻时是燕京大学合唱队的队长，同时他又是指挥，又是独唱，很有音乐天赋，我母亲学过五年钢琴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演出，每年春节期间都要去天津、北京两边跑，他们的合唱队很有名。所以可能我是有一些遗传基因的。1956年，经过严格筛选，我考入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小学，校址就在现在天津音乐学院十一经路院区。

问：小提琴的初学阶段可以说是非常枯燥、艰辛，刚开始学琴时您有没有抵触或者厌烦的情绪？

管文宁：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没有任何时候觉得不喜欢小提琴。我的启蒙老师是田中浩老师，他已经故去了。田老师是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调干生，当时儿童音乐教材非常少，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他编写的。每次上完课，他怕我记不牢，就把当天学的功课和练琴的要求写在本子上。他写的时候，让我到外面玩儿。我到院子里打秋千，玩儿够了回来找田老师，他也写好了，我拿着本子回家。记得有一次，他从资料室借来一台很古老的手摇唱机，让我听唱片，还给我沏了一杯糖水，削了一个梨。我边吃边听，曲调虽然简单，就是像《新春天》《思乡曲》《牧歌》这些小提琴曲，但在这种很享受的状态下听唱片，听到这么好的演奏，我觉得这个声音简直太好听了，我一定好好学，一定把它学会了。

问：除了田中浩老师，还有哪些老师对您学琴产生了直接影响？

管文宁：那很多了，比如天津音乐学院最早的小提琴教师之一郑会勤老师。郑老师曾师从马思聪，很有音乐天赋，形象特别好，拉琴的那个味道也特别好。郑老师经常一句一句地给我做示范，音准、技术都好说，但那个味道恐怕不是很容易就学到的，特别是演奏一些外国乐曲的时候。我后来问：“您教我们时是什么感觉？”郑老师说：“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像我的孩子。”我每次回课，拉一段曲子，甭管拉成什么样，郑老师都先说“好”，特别和蔼，那个“好”字让你觉得真是好，是真的夸奖你，让你自己都觉得很有成就感，然后再指出演奏中的毛病、差错。这样的鼓励给了学生很大的信心，也会比较积极地去改正不足，所以我每次上课前都怀着一种期盼的心情。

问：郑老师一直都是这样和风细雨吗？

管文宁：唯一的一次，我课下没有练好琴，回课时曲子拉得磕磕绊绊，几乎不成曲调。这次我没听到那个肯定的“好”字，郑老师只是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讲课。仅仅这一次，让我永远难忘。我学琴的第三年，有个同学拉《春节序曲》，我很喜欢，跟郑老师说：“我也想拉这个曲子。”郑老师回答：“你不要和他比，他学了几年，你学了几年？”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，让我明白学琴不能急于求成，处于什么样的水平，就练什么样的曲子。郑老师后来去了美国，七十多岁的时候还经常给我打电话，问我：“管文宁，你在拉什么曲子？”我说：“我现在在学生拉什么我就拉什么。”这时候郑老师仍在练琴、教课、登台演奏，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。我就

文 陈茗

想，老师那么大年纪还这么努力练琴，这么严格要求自己，我也要做得更好。

陈继续老师不苟言笑
其实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

问：田老师、郑老师让您如沐春风，学琴时心里会有欣喜的感觉，很快乐，但是我们说“严师出高徒”，您有没有遇到过严厉的老师？

管文宁：有一位陈继续老师，跟田老师、郑老师的风格不一样，上课时他从没有笑脸，更没说过“好”“有进步”这样的话。比如说，我是现在这个水平，那他就给我设定一个要跳起来才能达到的高度，当我下了很大功夫，好不容易提高了一点儿，陈老师的要求又是水涨船高，我跳起来都达不到了！其实他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，让我一直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。

问：什么时候陈老师才能说一句“好，不错”？

管文宁：有一次我跟陈老师一起听学生考试，陈老师问：“这个学生脑瓜儿挺好的，就是不用功，不用功咱们没办法。”他又说另一个学生：“这个学生很用功，可是他的条件不是特别好，也不理想。”我就问他：“陈老师，我是那个用功但脑子不行的学生，还是不用功但脑瓜儿好使的学生？”陈老师说：“你是又聪明又用功的学生！”哈哈，这是最高评价了吧？让我很意外，那时候我已经50岁了！

问：或许陈老师这种教学方法更能激励您往前走。除了不苟言笑，他还有哪些地方给了您比较深的影响？

管文宁：就学术来说，陈继续老师的观念很宽，不像有的老师，教了一个好学生就自己护着，不让别人碰。这样的老师还挺多的，因为学生的成绩也显示了老师的水平。但陈老师鼓励学生到别的地方去，跟别的老师学琴，听取不同的建议，希望自己的学生不要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框框里，所以他在学术上的心胸非常开阔。

问：在跟陈老师学琴的同时，您也跟别的老师学过吗？不会学乱了么？

管文宁：我在跟陈老师学琴时，也跟另外几位老师学过。比如盛中国老师，我去找他上过几次课，受益匪浅。我们一般人看曲子，可能就是拉得比较准确，到了一个速度，就觉得不错了，但盛中国老师在很多地方都有独到的见解，有很多细微的变化，让人听起来很“活”，能吸引人一直听下去，这给了我很大启发。另一位是林耀基老师，早城市里经常停电，我到林老师那里去学琴，如果赶上停电，他就点上三支蜡烛，坚持给我上课。我在学琴的过程中没有走弯路。

从自己演出到指导学生
恨不得上台替他们去拉琴

问：上台演奏之前您会做哪些准备？紧张吗？

管文宁：这么多观众期待你的演奏，你就得想，怎么才能呈现最好的状态，需要的是分一秒、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去揣摩、练习。演奏者要精益求精，在台上不能出现纰漏，技术上要尽可能地完整，音乐表现上要尽可能地充沛，所以自己就会不停地去追求，压力很大，也紧张。

问：在音乐领域，专业的和业余的还是有所区别的。就拿歌手来讲，可能业余歌手的某一句、某一个高音唱得非常好，甚至超越了专业的歌唱家，



管文宁

1947年出生，小提琴演奏家、天津音乐学院教授。曾任天津音乐家协会小提琴专业委员会会长，全国少儿小提琴比赛，CCTV中国钢琴、小提琴大赛评委。

但是就整首作品来说，他可能在一个关键节点上过不去。拉琴也是这样吗？

管文宁：我在搞讲座的时候，就有听众问，什么叫专业，什么叫业余？让我给划一个界限。其实专业指的是你的职业，你在从事这个职业，所以你是专业。你在你的职业之外从事这个事情，你就叫业余。但是，不能说专业的水平高，业余的水平低，不能这么说。当然，从事这个职业的人，应该做得更好。就个体来讲，可能的业余的还会超过专业的。

问：从台前到幕后，成为执掌教鞭的教授，您是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演奏技法传授给学生的？

管文宁：刚开始身份转换，我很纠结，从自己演出变成看学生们考试、演出，我经常恨不得上台替学生去拉琴。一直就想，怎么能够启发学生，让他们演出能更好一点儿？或者督促他们，让他们更用功一点儿？时间长了我发现，学生不是我，我不能代替他们，我要想办法去教导他们，这个教导和我自己练琴是不一样的。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因材施教，先要了解学生各自的特点，然后有针对性地去教学，逐步规范他们演奏的基本动作，尽可能使他们掌握演奏小提琴的基本思路，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，还要给学生做比较准确的示范演奏，启发他们感受声音和动作，逐步提高他们对音乐的分辨能力和专业技巧。

问：您说过，您看一个学生拉琴，一眼就能看出他哪方面的基本功比较欠缺，那您听一些成名的演奏家拉琴，能听出他们的小瑕疵或毛病吗？

管文宁：有，一般人可能听不出来。比如有一年韩国的郑京和来北京演出，之前她病了很久，尚在恢复期。整场演出，她每一首曲子都有些小瑕疵，但必须是对作品特别熟悉的观众才能听得出来。当然瑕不掩瑜，这丝毫不影响她的整体表现，她是真正的大师，是在顶峰上的人！

讲述

盘山“八路军三兄弟”后人，个人出资建红色记忆纪念馆 红色藏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财富

文 董秀娜

蓟州区许家台镇新房子村距离盘山只有五六公里的路程，周围山峰层层叠叠，零零散散的民居错落有致。当地人知道，新房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峰个人出资，建起了一座红色记忆纪念馆。我和朋友一起，带着好奇进得山口，见到一幢红色建筑矗立在眼前，八根石柱顶天立地，金色的柱头熠熠生辉，十级台阶通向拱形大门，门前旗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。王峰带我们参观纪念馆，讲述了他收藏红色文物的故事。

八路军三兄弟的后人 打小听着抗战故事长大

王峰出生于1963年，小时候家里穷，一家人住在石头房子里，吃顿饱饭就算过年了。10岁时他才上小学，山村学校条件简陋，只有桌子，没有板凳，学生上学要自己带着凳凳，可王峰家里一穷二白，他只能站着听课。王峰的父亲、大伯、二伯都参加过八路军，在盘山抗日根据地是远近闻名的“八路军三兄弟”。

大哥王友发1916年出生，16岁参军，担任过区小队队长。1940年5月18日，在大石峪战役中，王友发是机



新房子村红色记忆纪念馆

枪手，凭着对地形十分熟悉，带部队从新房子山口突围。后来他因身上有伤，没跟部队南下，回家务农，在生产队当过保管员，尽心尽责。

二哥王友顺1922年出生，1938年新婚第二天跟着大哥参军，成为八路军十三团战士。他参加过多次战役，1943年在密云战役中牺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给王友顺的遗孀发放了烈属抚恤金，大哥王友发把长子王芬过继给她。

三弟王友和就是王峰的父亲，他1929年出生，16岁结婚，婚后第三天参军，在八路军部队当司号员、通讯员。他一生视军如命，上了年纪后还经常在村里吹军号，乡亲们都说他的军号吹得好极了。

山给八路军送情报，被日本兵发现，穷追不舍。王友和跑到白草洼，看见一个獾子洞，一头钻了进去。日本兵四下找不到人，就朝洞里扔烟幕弹。洞内瞬间浓烟滚滚，多亏獾子洞洞时留着通风口，王友和用袄袖子堵住嘴，才侥幸活下来。那时正是腊月，他又冷又饿，不知道日本兵走没走，夜里偷偷爬出来找吃的。但冰天雪地里哪有吃的，只能扒一点干树皮充饥。躲了几天，确定日本兵不会再来了，他才爬出獾子洞，抄小路把情报送到了八路军指挥部。

还有一次，日军包围了村子，把村民集中起来，架起两挺机枪，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人群，翻译官厉声喝问：“谁是八路？不说全都枪毙！”有个村民实在害怕，吓得尿了裤子。日本兵把他抓出来审问，那村民瞅了瞅人群

中的王友和。日本兵也不是白给的，狞笑着冲过去，把王友和押出人群。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声说：“他不是八路，他就是我们村的，天天在村口练摔跤！”正巧带队的日本军官也爱摔跤，听完就要跟王友和比试比试。王友和豁出去了，接二连三把那军官摔倒在地下。军官被他摔得心服口服，也是为了收买人心，冲王友和挑起大拇指，把全村人都放了。

王友和告诉王峰，当年东山有一座财神庙，西山有一座山神庙，两座庙门前各有一棵“假树”，有人在树下放哨，发现日军来了，就把树放倒，村里人马上躲起来。有一次日军偷袭，放哨的人发现时为时已晚，12名村民被日军残忍杀害，这就是当地有名的“新房子惨案”。

王友和参加过热河战役，身负重伤奄奄一息，熬了九天九夜才缓过劲儿来，保住一条命，但身体里残留着许多弹片。直到65岁去世，遗体火化后，还留下了十几块碎弹片，被王峰珍藏至今。

从一枚毛主席像章开始 收藏背后精彩纷呈

改革开放初期，王峰到邦均镇，跟当地有名的木匠于连荣学手艺。于师傅常常带着徒弟出门干活，大到庙宇，小到农舍，啥活儿都接。王峰人聪明，也肯吃苦卖力气，几年下来，什么木匠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。1985年，22岁的王峰自己带队包工，挣钱养家。听人说城市正在大规模建房盖楼，需要大量建材，是个挣钱的机会，他说干就干，解散了包工队，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建材厂，通过不断扩大销售发展起来。一千二十年来，蓟州的建材厂关

停并转，王峰又到遵化办厂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王峰逛蓟州古玩交易市场，偶然买到一枚毛主席像章。这让他回忆起小时候听到的那些抗战故事，也是从那时起，只要有机会他就收集红色藏品，数量越来越多，品种越来越丰富。

他听说抚顺有人收藏了一尊汉白玉雷锋塑像，准备转手。抚顺是雷锋参军、牺牲的地方，这尊雷锋像非常珍贵。他开车赶往抚顺，以3.8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尊雷锋像。

在王峰收藏的上百万张报纸中，最珍贵的一张是1949年10月1日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刊登着开国大典的新闻。那是在2000年，北京潘家园举办“红色藏品交易会”，王峰看到了照片，立即赶到现场，以1.3万元的价格购得了这张报纸。

唐山古玩市场有人出售一套四件毛主席像彩盘，是当年国富唐山第一瓷厂生产的精品。王峰见到卖家，对方坚持要50万元，而王峰只带了30万元，他提出先把车押给卖家。卖家见王峰确实有诚意，跟他去了停车场，看到汽车后痛快地说：“你把车留下，四件瓷器都归你了！”就这样，王峰租了一辆车，带着彩盘回了家。王峰后来改成了骑摩托车，有人问他后悔吗？他说：“汽车随时都能买，而特定年代的红色藏品是无价之宝，绝对不能错过！”

他也曾为了一件藏品，和同伴一起赶赴内蒙古，日夜兼程，越往前走人越少，路越荒，甚至找不到吃饭的地方。夜里在加油站勉强住下，但根本无法睡觉，因为从未见过的蚊子咬得他们束手无策。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，见到收藏者，却发现所谓的藏品只是仿制品！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王峰说：“类似这样失败的经历太多了，但我也并不因此而懊恼，因为求而不得也是收藏的乐趣之一。”

建红色记忆纪念馆 革命精神代代相传

二十几年的时间，王峰收藏了数万件徽章、文献、报纸等红色藏品，家里四处堆放得满满当当。2012年，他决定在家乡建一座红色记忆纪念馆，珍藏革命先烈的故事，让子孙后代永不忘本。

修建纪念馆时，同村的胡金泉免费提供水泥和砂浆，那均的王猛捐助3万元，张景云捐助一万元，三河的李玉如捐赠了保温板……本以为能顺利完工，但资金还是出现了亏空，此时王峰的妻子仇淑兰把一个存折交到了丈夫手里。山里人不善表达，她也没说什么话，但王峰心里觉得热乎乎的。

纪念馆内收藏了毛主席塑像万余尊、像章37万枚，藏有记载着共和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等历史时刻的报纸，还有1938年出版的《论持久战》等文献书籍。王峰父亲参加八路军时吹过的那把军号，也作为藏品在纪念馆展出。

远近周围的人们闻讯来看，接受红色教育。当地政府对王峰和他的纪念馆很多支持，许家台镇派党务工作者来做义务讲解员，村里不少人也常来帮忙打扫卫生。北京一位叫孙桂香的老大姐是老兵后代，参观纪念馆后被深深感动，捐赠了红地毯、桌椅等物品。

2018年，王峰开始担任新房子村党支部书记，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由于地处偏僻，新房子村一直没开发农家院，王峰帮儿子开了农家院、农家饭店，不为自家牟利，只是想给村民做个示范，带领大家共同富裕。不久前，他还与卢家峪、田家峪、许家台、瀑水村达成合作意向，准备打造五村联合的红色旅游线路，把红色记忆传承下去。他预计，近年来参观纪念馆的人数会更多。

(照片由受访者提供)